

王运熙 顾易生 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上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博学

博
学



文学史系列

王运熙 顾易生 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上册)

顾易生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复旦博学·文学史系列

A large, faint watermark of the Fudan University seal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seal is circular and contains the university's na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復旦大學' and the founding year '1905'.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论语》)

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
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

作者简介

王运熙，男，1926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乐府诗述论》、《望海楼笔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李白诗选》、《李白研究》等。

顾易生，男，1924年12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柳宗元》、《诗词助读》、《宋词精华》、《十大散文家》等。

袁震宇，男，1928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著有《明代文学批评史》（合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宋词精华》等。

黄霖，男，1942年6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代文学批评史》、《古小说概观》、《金瓶梅考论》、《中国小说论著选》（合著）、《原人论》（合著）等。

杨明，男，1942年11月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合著）、《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合著）、《刘勰评传（附钟嵘评传）》、《南朝诗史》、《文赋诗品译注》等。

邬国平，男，1954年10月生。复旦大学副教授。著有《清代文学批评史》（合著）、《清代文论选》（合著）、《中国文论选·近代卷》（合著）等。

内 容 提 要

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全书内容系统，对于诗文、小说、戏剧各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论著，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本书在撰写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稳妥，叙述平实；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前 言

我们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集体编写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被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流行颇广。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论著、论文数量众多,其中并有若干有分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著。我们也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集体编写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些都为出版较早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部批评史新编,以原来的三卷本为基础,体例框架大致照旧,分为两册,按时代前后,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在内容方面则变动较大,对原著作了许多增删,重写了不少章节,改正了过去一些不妥当的提法,因此改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内容的改动方面,主要吸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成果,也参考了时贤的若干看法,由于体例限制,未能一一注明,请读者谅解。

原著编写者除我们两人外,尚有袁震宇、李庆甲、黄霖同志,刘大杰先生曾对上册进行审阅,并作了部分修改。前此,刘先生、李庆甲同志已先后去世。参加此次新编撰写工作的是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黄霖、杨明、邬国平同志。具体分工如下:

杨 明:第一编,第二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

王运熙:第二编中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编中的第一章第四、五节、第二章、第四章。

顾易生:第四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编中的第一章。

袁震宇: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编中的第二章,第六编中的第五章,第七编中的第二章。

黄 霖: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编中的第三章,第六编中的第六章,第七编中的第一章、第三章。

邬国平：第六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四、五、六、七各编的绪论由顾易生、袁震宇、黄霖、邬国平共同撰写。

王运熙 顾易生

2001年2月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目 录
上 册

第一编 先秦两汉

绪 论	3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批评	10
第一节 《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	10
第二节 孔子(附《易传》)	14
第三节 孟子	21
第四节 荀子(附《礼记·乐记》)	23
第五节 老子、庄子	29
第二章 汉代的文学批评	38
第一节 诗大序	38
第二节 司马迁	42
第三节 扬雄	45
第四节 班固和王逸	49
第五节 王充	56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

绪 论	63
第一章 魏晋的文学批评	70
第一节 曹丕、曹植	70
第二节 陆机	76
第三节 晋代的赋论和总集的编纂	82
第四节 葛洪	86

第二章 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90
第一节 文笔说	90
第二节 声律论	93
第三节 裴子野、萧统、萧纲	98
第四节 颜之推、苏绰	104
第三章 刘勰《文心雕龙》.....	109
第一节 绪说.....	109
第二节 基本思想.....	112
第三节 论内容、形式和体制	118
第四节 论风格与文风.....	126
第五节 论文学与自然景物、时代的关系	133
第六节 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138
第七节 结语.....	145
第四章 钟嵘《诗品》.....	149
第一节 绪说.....	149
第二节 论五言诗的思想艺术标准和历史发展.....	151
第三节 论五言诗作家及其流派.....	155

第三编 隋唐五代

绪 论.....	165
第一章 隋和唐代前期的文学批评.....	172
第一节 隋代文论和唐初史家、政治家的文学观	172
第二节 陈子昂等.....	178
第三节 刘知幾.....	182
第四节 李白.....	186
第五节 殷璠与《河岳英灵集》.....	189
第二章 唐代中期的诗论.....	193
第一节 杜甫和元结.....	193
第二节 皎然、高仲武	200
第三节 白居易.....	208
第四节 元稹.....	215

第三章 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	221
第一节 古文运动的前驱者·····	221
第二节 韩愈·····	227
第三节 柳宗元·····	234
第四节 韩门后学·····	238
第四章 唐代晚期和五代的文学批评·····	245
第一节 杜牧、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	245
第二节 司空图及其他·····	252
第三节 五代的文学批评·····	260

第四编 宋 金 元

绪 论·····	269
第一章 北宋的诗文批评·····	278
第一节 宋初的诗文批评·····	278
第二节 欧阳修(附梅尧臣)·····	290
第三节 王安石(附李觏和曾巩)·····	300
第四节 苏轼(附苏洵、苏辙、张耒)·····	305
第五节 黄庭坚·····	319
第二章 南宋的诗文批评·····	327
第一节 吕本中和张戒·····	327
第二节 陆游、杨万里和姜夔·····	335
第三节 朱熹和理学家的文学观·····	346
第四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和戴复古、刘克庄·····	354
第三章 宋代词论·····	366
第四章 金元的文学批评·····	385
第一节 金元的诗文批评·····	385
第二节 戏曲批评的萌芽和金元曲论·····	403
第三节 小说批评的萌芽及罗烨《醉翁谈录》·····	416

第一编 先秦两汉

绪 论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与文学有关连的意见,大抵只有片段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学术著作中。两汉时代则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的意见,有许多仍是片段的,散见于哲学、历史等著作中。但已出现了一些专篇的论文,如《毛诗序》、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议论较为系统。《诗经》和《楚辞》的注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具体作品的理解,也是研究汉代文学批评应该重视的资料。

文学、言、辞、文章

学习、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首先应注意辨明若干名词概念。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学作为物质手段而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的作品。但在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先秦典籍中,如《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汉代依然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淳曰,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文学”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一语常常指儒学而言。如《史记·孝文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儒林列传》:“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总之,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先秦典籍中有论及“言”、“辞”的资料。言、辞当然与运用语言有关。上举《论语·先进》所说“言语:宰我、子贡”,便是说宰我、子贡长于政治外交辞令、宾主应对等语言表达。以文字记录语言,便是文章。因此典籍中论及言、辞之处,虽然还不能说等同于今日之论文学,但至少可以作为论文章写作的资料看待。

到了汉代,写作能力日益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类应用性文字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再一方面也是由于辞赋等受到帝王、上层人士的喜爱,实际上被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于是就用“文章”一语指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或指具有写作才能。“文章”一语先秦时就有,但只是泛指文采彰明之意;汉代则在沿用其旧义的同时,赋予新义,用以指写作。有时也说成“文辞”、“文词”。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又《三王世家》太史公曰:“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又如《汉书·地理志》:“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又《公孙弘传赞》:“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文章”既指写作,则与今日所谓“文学”有关系,但仍不等于今日之“文学”。因为当时“文章”所指范围甚广,富于审美性质的辞赋、诗歌固然在内,而一切实用性文字也都包含在内。《汉书·扬雄传》云:“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可见学术性著述也好,审美性强的作品(辞赋类)也好,成部的著作也好,单篇制作也好,都在“文章”范围之内。

先秦两汉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的含义仍然宽泛,指一切用文字写下来的作品。“文学”也仍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但与先秦两

汉相比,又有重要的变化:由于在知识分子中,写作渐渐成为极普遍的事,写作能力几乎成为士人文化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文学”自然而然地常常包括了写作之意,而可以理解为常兼指文章与博学两方面的意义。当然,其含义与今日所说“文学”仍不等同。

综上所述,我们研习文学批评史,见到典籍中“文学”、“文章”等语词,须仔细辨别,不可轻易认为就相当于今日之“文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先秦时人们的文学观念还十分薄弱。也就是说,当时人议论作品时,几乎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例如《诗经》,就基本上不是被当作动人的抒情诗歌,而是被当作修身和从事外交、政治活动的工具加以议论的。汉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仍然用很强的功利性的眼光评论文学作品,甚至因此而轻视、排斥文学的审美性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包含审美因素的言论,也有人从审美娱悦的角度肯定文学作品。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先秦时诗歌与音乐紧密配合,诗、音乐、舞蹈往往三位一体。因而人们对于诗与音乐的见解,也常是相互联系,有时不易分别。但诗论与乐论毕竟不完全等同,我们应看到其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注意其区别。事实上,先秦乐论的审美因素多于诗论,而逐渐影响及于诗论。

儒、墨、道、法诸家的文学观

春秋战国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思想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诸子争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的论著中,包含不少与文学有关连的见解,它们虽大都尚未形成完整的篇章,但已有一些较为深刻的原则性的论点,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儒家在这方面的观点,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道家虽没有多少与文学有关连的言论,但由于其思想、著作对后人影响深刻,因而当文学创作、批评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便由道家思想得到启发,运用其著作中的概念、命题等来表述对于文学的看法。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很重视文化、学术。他的言谈中有关文学者,一是论“诗三百”,二是论言辞。他赞美“诗三百”“无邪”,认为“诗三百”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是修身和从事政治、社会活动

所必需的教材和工具。在语言表现方面,他首先强调内容,但也重视文辞的表达、修饰。孟子在阅读、理解作品方面,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他的“知言养气”之说,对于后世文学批评也很有影响。荀子非常重视言辞、辩论。他是最早对儒家圣人和经典作崇高评价的学者,他这方面的言论可以视为后世文学批评中明道、征圣、宗经说的先声。《荀子·乐论》和总结孔子后学音乐思想的《礼记·乐记》,都非常重视“乐”。一方面指出了乐产生的基础、乐对社会的反映及其认识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乐对人们的教化意义。先秦儒家的乐论谈到了乐与人们情感、心理的关系,比起先秦时纯粹的诗歌理论来,较多地具有审美的因素。而这些论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又有深远影响。不论孔子还是孟子、荀子,都很重视诗歌、言辞、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利用它们为教化服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文艺思想适合于统治阶级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其中某些观点又能触及文学的基本规律方面的问题,故在文学批评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是东周时的一个重要学派,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其创始人墨翟,鲁国(一说宋国)人,略晚于孔子。墨家从实用、功利的目的出发,重视言辞辩论。《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意谓言谈须有标准、目的。同篇提出“言必有三表”,即以古圣王之事、百姓的实际经验、运用于政事而产生的效果三者作为检验言谈的标准。《墨子》书中又总结了言谈辩论的种种方法,如运用假设、譬喻、类推等等。这些论述虽是论言谈,但实有益于说理论文的写作。对于人们的艺术审美活动,墨子采取排斥态度。他认为音乐、歌咏、舞蹈、美术等虽给人以快乐,但却奢侈浪费,“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认为儒家“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活动,荒废时日,妨碍君子听治、庶人从事。(见《墨子·公孟》)此种观点,在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概排斥审美活动,其实是狭隘片面的。

法家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商鞅奠定了法家理论的基础,韩非则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崇尚耕战,主张君主独裁,厉行法制,对于传统文化学术和儒、墨、名、纵横诸家学说,认为不切实用,而且妨碍其愚民政策的实施,故加以全面排斥。他们将《诗》、《书》、学问言辩之士斥为虱子、蠹虫。虽然他们也有少数言论涉及言辞,如要求制定法令须“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又如《韩非子·难言》说到游说人主时种种言辞的不同风貌,又如《韩非子》中某些寓言故事(如秦伯嫁女、买椟还珠)可以被借用来反对过分雕饰

文辞,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学派对于文学批评极少贡献。

道家主要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有要求回归上古简质淳朴时代的倾向,因而对音乐、言辞、辩论等都持否定态度,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认为美丽的色彩、音乐使人“失性”。但是《老子》、《庄子》却对后世的文艺思想,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无为,那原本不是论文学。但当文学创作、鉴赏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崇尚自然的主张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上,成为反对雕琢、提倡自然之美的理论根据。《老》、《庄》书中关于语言局限性、言与意的关系的论述,启发了后世作家、批评家对于含蓄之趣、意在言外那种艺术表现的体会、认识和追求。又如《老》、《庄》书中对于虚静、“坐忘”心态的论述,原是就体认“道”而言的,但也被借用、引申,用以论述艺术家、作家的思维特点。道家学说之所以会影响到后世的文学批评,与后世知识分子对其热烈喜好,他们的人生观、精神世界受到道家学说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最后,还应提一下屈原的发愤抒情之说。其《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指出自己的作品乃是在愁思郁结、愤懑无告、“愿陈志而无路”的情况下倾吐而出。《九章·抽思》云:“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更说到凭借写作以舒泄忧思、暂时获得解脱的情况。屈原的说法,比《尚书·尧典》“诗言志”之说更突出了情感因素,可说是后世发愤著书、不平则鸣以及借作文以自慰诸说的先声。

汉代文学批评的演进

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较过去有很大发展。韵文方面,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歌,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辞赋在《楚辞》和纵横家辩说的影响下,产生了很多作家作品,《史记》、《汉书》都为擅长辞赋的作家立了专传。刘向、刘歆编校图书,在《七略》中特立“诗赋略”登录并论述诗赋,就是诗赋作品大量涌现的实际情况的反映。在散文方面,除一部分学术、历史著作中具有文学价值的篇章外,各种体裁的单篇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论说、书序、奏议、书启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还有韵文体和韵散结合的文体颂、赞、箴、铭、哀文、诔、碑文等等。这许多体裁的文章,大多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用的文体,但同时人们也注重它们的写作艺术、审美因素。两汉文学批评的发展,就是建筑在上述文学创作发展的基础之上的。